

# 什麼是「番」—— 逆寫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意象

■ 劉柳書琴

2000年以來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多次原住民族相關展覽。本展覽〈什麼是「番」——逆寫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〉，是繼〈披荊斬棘——17世紀後的臺灣〉（2002-2003）、〈福爾摩沙——17世紀的臺灣、荷蘭與東亞〉（2003）、〈黎民之初——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〉（2006）、〈織路繡徑穿重山——臺灣原住民族服飾精品聯展〉（2018）之後，又一次有關臺灣族群檔案的展示。所不同的是除了主流的展示法，這次更在累積當代原民文化資產之思維上，進行國家典藏物件的去殖民工作。誠如美國學者安東尼·豪爾（Anthony J. Hall）所說：「在全球歷史進程中，西方世界的使命無疑等同於文明（世界）的使命。」<sup>1</sup> 本次實體展場以對位閱讀的方式，檢視清帝國的華夷秩序與群番系譜，從中追溯臺灣社會逐漸棄用的貶抑詞——「番」的由來；展覽網頁則以開放參與的「逆寫」活動，提供讀者參與檢視帝國之眼。整個展覽欲顛覆西方中心的現代史觀，更欲反思東方帝國的殖民政治與文化政治，乃至國家博物館對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轉化性復興的社會責任。

## 逆寫帝國：第三世界的後殖民論述

逆寫帝國（The Empire Writes Back），為澳大利亞學者比爾·阿希克洛夫特（Bill Ashcroft）1989年出版的著作。（圖1）他以「write back」一語表達英語世界中，後殖民文學對殖民主義歷史及其政治話語的重寫與去中心化（decentring）。主要方法包括重置語言（re-placing language）、重置文本（re-placing text）、挪用（appropriatio）、棄用（abrogation）、援用本土典故（allusion）與理論（indigenous theory）等等，藉此形成跨文化性的主體重構與對抗論述。<sup>2</sup> 《逆寫帝國》有別於薩依德（Edward Said, 1935-2003）《東方學》對西方宗主國的東方主義話語之側重，直接以殖民地文學為主體關注東方自身，被視為後殖

民理論建構的重要開端。

然而逆寫的概念，實則源起甚廣。譬如顛覆與重寫，亦是印度學者霍米·巴巴（Homi K. Bhabha）後殖民理論的兩大策略。顛覆，指瓦解西方在時序上將自身定義為歷史先進和種族中心的認同典範。重寫，則指對這一典範的反述（writes back），也就是「他者」自我再現的書寫，通過翻轉他者而取得自我定義下的他性，通過堅持差異來消除中心定義下的差異，通過建立少數論述以牽制從中心發出的主導論述，藉此恢復一切被邊緣化、被他者化、被殖民化之離散族群的主體性。巴巴認為：重寫的目的在於打破西方「處於中心的自我描述」（the center's narration of self-description），揭穿對離散者「被遲後化」（delayed）的歷史

虛構，並據之質疑（interrogate）現代性。透過重寫，進而顛覆，從中看見文化組成的混雜性，世界的描述模式不是單一的大敘事，而是透過無數的小敘述所構成。<sup>3</sup>

非洲作家的理論，也充滿啟發。歐洲中心主義往往將非歐洲主體視為他者，因此非洲作家認為，文化解殖不只建立在反殖民論述上，更要解構歐洲中心主義，並重建後殖民論述中的非洲主體性。出身尼日利亞的欽努阿·阿契貝（Chinua Achebe, 1930-2013）所著的《崩離析》（*Things Fall Apart*）與《紛擾不息》（*No Longer at Ease*）被視為非洲逆寫的先驅。<sup>4</sup> 逆寫在此除了回應主流文學傳統對非洲文化的描繪，也反思了非洲人在論述中的主體性與戰略。

### 介入書寫：孫大川的臺灣原住民族逆寫

回到臺灣的脈絡，臺灣原運的興起受到 1930 年代起持續的黑人性運動（Negritude）及 1980 年代原民現身風潮（indigenous presence）啟發。美國學者詹姆斯·克里弗德（James Clifford）曾以文化的銜接（articulation）、表演（performance）

和翻譯（translation）三種模式，解釋 1980 年代以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運動。臺灣為全球原民族文化復振運動的一個節點，同樣不訴求本真性或回歸烏托邦的過去，而以傳統的轉化性存續為目的，這在代表性論述者的意見上清楚可見。<sup>5</sup>

孫大川（Paelabang danapan，卑南族），是全面投入臺灣原住民族「文化存續」與「法政存續」戰略及實踐的一位先驅。他的行動啟始於 1988 年，至今不輟。他提出諸多重要的聲稱，包括——臺灣原住民族被殖民的命運，不同於歐洲中心論對其它地區的殖民，「臺灣唯一被殖民的只有原住民族」。認同問題的核心與文化再現有關，因此原民文化的去殖便無法迴避對漢文再現的顛覆與重寫。1993 年他號召籌組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，展開系列行動，就是要「建立原住民介入書寫的基地」。他提出的「介入書寫」一詞，對外挑戰了漢文容受異己文化的邊界，對內則與族語傳承連結，企圖多方活化原民的主體世界。

他對民族「黃昏處境」的存續急迫性、文化去殖民、生命完整性的許多論述，除了抒發



圖1 《復返：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、《逆寫帝國：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》、《夾縫中的族群建構：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、文化與政治》書封。取自註釋2、5、6。

於其 1991 年出版的第一本文集《久久酒一次》之外，<sup>6</sup> 主要收錄在《夾縫中的族群建構：臺灣原住民的語言、文化與政治》一書。（見圖 1）此書不只探討原住民文學的範疇界定、文化使命與困境，更提出「原住民傳播」一詞。原民書寫與傳播如何介入漢文傳播，他持續提出的觀點可歸納如下：<sup>7</sup>

一、在發聲主體方面：原民傳播歷經了兩階段，從第三人稱（被代言的從屬階級）回復第一人稱（歷史見證／原民發聲／逆寫帝國）；進而形成互為主體的對話（異己對話／你我共筆）。

二、在傳播媒介方面：原民傳播從「無文口傳」到「文字再現」，進而橫跨多媒體、藝術展演或社會運動。譬如，因創辦原民報刊雜誌電視臺而得以翻譯、銜接和生產「第一人稱的原民文獻」；又譬如，從掌握專業知能、藝術象徵系統，而得以轉譯傳統，與優勢文化、全球文化協商和對話。

三、在語言文字方面：他反對本質化的身份認同和母語主義，排除先驗概念或二元對立邏輯，主張「族語傳承」和「介入（漢語）書寫」是維護文化母體同時掌握主流語言，不相抵觸的策略，不同層次的工作。他主張漢語的語彙、象徵、文法及表達方式應予彈性容認，族語拼音系統也應尊重作者的慣用和選擇。

四、在公共性的拓展方面：第一人稱非文字的「部落傳播」，小範圍、情境性、受主體變化限制，是不穩定的內部傳播。因此他主張當代的「原民傳播」必須克服全球原民過去面臨的非文字傳播劣勢，結合新媒介，「全面性地介入臺灣的書寫世界」，在公共領域之中啟發原住民的能動性。

瓦歷斯·諾幹（Walis Nokan，泰雅族），是最早提出「原住民逆寫」一詞，並身體力行

的作家。他曾言：「因為逆寫，原住民書寫的去殖民才有可能展開」，「原住民文學應以逆寫帝國中心為己任」。他提出的策略包括：一，對帝國中心的控訴，從歷史政經文化各個層面進行抗爭。二，使用神話、傳說、儀式、禁忌、戰爭經驗等召喚集體記憶，創生新詞，並對帝國中心的語言進行棄用和挪用。第三，挑戰帝國中心對原住民知識的建構和詮釋，建立原民世界觀等。<sup>8</sup> 時至今日，上述主張早已在許多作品中獲得新穎深刻的開展。

孫大川支持「去殖民的逆寫」，此外更提示一種「大於書寫的重寫」。他提防「無文民族」的簡化論調，多次指出「非文」形態的語言性，並例舉聲情、靈性、身體、樂舞祭儀、工藝、底層文化規則等等文化語言。<sup>9</sup> 他也曾指出祭樂舞當中「扼要、濃縮、重覆」之語意特質，認為「正因精要反能穩固傳遞」，並提供人們想像部落「宇宙性格及神聖感的必要空白」，而「宇宙性格」及「神聖感」特別是原住民與自己或與傳統對話、銜接的重要途徑。<sup>10</sup> 「原始性」和「第一自然」是原住民活力與創造力所繫之處，將第一自然作為一種認同、作為一種身體儀式，自原運世代作家以降已是重要的書寫策略。這些超語言的共鳴，身體的實踐，人格的轉化，也都是大於文字的逆寫。<sup>11</sup>

不同於阿希克洛夫特、霍米巴巴、阿契貝等人從符號學和文化學，對英、法語系殖民主義霸權提出的批判，孫大川從四百年來南島文化與漢文脈鬥爭的歷史脈絡，臺灣原住民族形成的第一人稱「介入書寫」和「非文逆寫」，轉身探尋更繁多的人類認知與表意傳統。在他的論述中，文化解殖不單建立在對漢文霸權的去殖重寫，更且在重新疆界化文字的霸權或其無能之處，回返第一自然的非文思維尋找生機。





圖2 巴代《暗礁》、夏曼·藍波安《大海浮夢》、瓦歷斯·諾幹《伊能再踏查》書封。取自巴代，《暗礁》，新北：印刻，2015；夏曼·藍波安《大海浮夢》，新北：聯經，2014；瓦歷斯·諾幹，《伊能再踏查》，臺中：晨星，1999。

筆者認為，介入性的顛覆，大於書寫的重寫，是更為根本的逆寫；對漢語的干預，是控訴競合的場域，也是差異共創的第三空間。

歸納孫大川的論述，可以看見原始性、第一自然、介入書寫、非文逆寫、原住民文學、原住民傳播，構成了一組可延伸概念。若同時參照逆寫成果豐碩的夏曼·藍波安、瓦歷斯·諾幹、巴代等人的創作（圖2），則原民逆寫的技巧至少有第一人稱書寫、複線歷史、對位書寫、多元敘事觀點、底層人物發聲、陰性書寫、創傷書寫、非虛構敘事、差異論述、戲仿、諷刺等。在解構資本主義書寫文化方面，族語書寫、族語介入華語、陌生化語言、文化翻譯、創造新詞、口傳文化復振、南島藝術連結等，都是常見策略。在去殖民方面，則表現於對少數說話、族裔論述、轉型正義、反西方中心主義、去除汗名等等的致力。

逆寫，是原民現身的一體兩面。介入，在殖民者的語言文字之中，也在其外。其外即是優勢主流文化曾幾何時遠離了的第一自然。

## 滿洲殖民主義脈絡下的原民生成

博物館展示是充滿權力的場域。展示是一種論述，用於建構、解構或重新脈絡化不同立場的知識，是充滿新意的翻譯，也是一場社會實踐。

本展的第一檔（2022.3.19-6.19）以三個單元，展示清宮舊藏中官員撰述和繪製的臺灣原住民族（番子 / fandz）。被挑選的展件不少是清帝國異己表象的經典文本，在促進泛族意識浮現的「臺灣原民生成」（Taiwanese indigenous becoming）方面發揮過影響。策展團隊洞見它們，透過原民作家共寫、觀展人逆寫、教學工作坊等延伸設計，意圖使這些藏品成為「原民現身」援用的資產。

展場上，直球對決式的「身分與族群」與「想像與獵奇」兩個單元，以身份、族群、（番）界為關鍵詞，梳理臺灣原住民被帝國內在化的過程。

首先，策展團隊從清帝國對其廣域治理的族群之命名法、政治秩序的形成與變貌，揭示

如今益發尖銳爭議的「番」稱——不特為臺灣獨有。番稱，起於元代，最初只是有關賦稅的稱呼，後來才帶有非文明的歧視意味，至明清兩朝，四川、甘肅等地也有熟番、生番之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從明代出現的「東番」一詞，到清代發展出「生／熟／化番」等具流動性的治理分類，則確實是在臺灣的社會現實中才形成的指涉與操作。這種後設觀點的再現，對原民分類的背景或集體稱謂的考掘，呈現了歷史上「原民生成」的軌跡及偶然性，是對「番」字詞本源的一種逆寫。

其次，策展團隊從奏摺、官書、志書、輿圖、職貢圖等，呈現康雍乾盛世經歷拓墾與民變，其劃「界」分治的原則如何至乾隆朝成形，又在嘉慶、道光以後被平埔族的遷徙等因素漸次打破。生／熟／化番的行政治理，在有關「社」的地理空間標定、風俗文化的調查詮釋、律法與賦稅身份的界定、防戍的義務與動員，尚需要文化論述與文化政治等操作搭配，以促成體制化，亦即讓「番子」催熟，讓未歸化的民群

併其生活領域，悉皆內附於帝國。然而，殖民者／拓墾者／生熟化番並非同心圓結構，三方也不僅三邊。漢人為主的拓墾者與官方經常形成利益交換，有時卻也激烈對抗。官／民／番利益矛盾時，族群、地域、歸化程度都未必是敵我分界，有時連生番都成為官方的同盟者，這在林爽文（1756-1788）事件中清晰可見。因此，策展團隊一方面再次獻出文獻本位、即清帝國觀點的沙畫〈赴京朝覲——原住民進京傳奇〉（圖3），另一方面由沙畫故事的作者進行自我逆寫，此外更邀請一般群眾參與逆寫，藉此從原位與後設（meta）的不同層位，觀察歷史中的原民能動性（indigenous agency），這是一種逆寫。

第二單元「想像與獵奇」，則從清代旅臺官員的文集到地方志的增采傳抄，檢視官宦作者、漢文素養、紀實、想像、偏見、經世期望對書寫的影響。從展件中可以發現，清帝國實由漢人官員代理族群論述之書寫，漢文化中心之東方主義，以及觀風資治的現實政治考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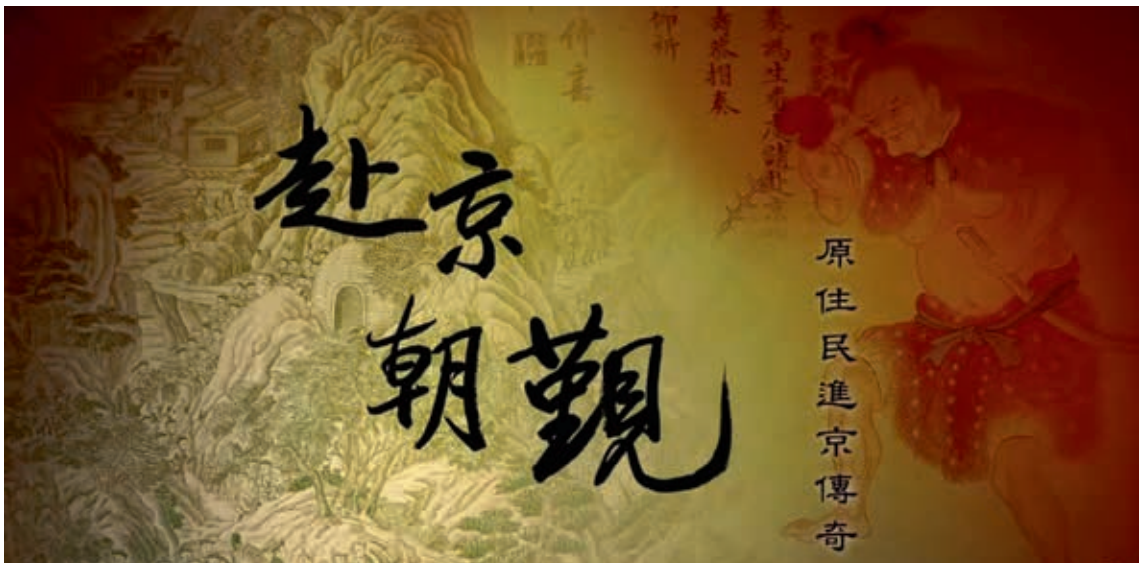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〈赴京朝覲——原住民進京傳奇〉影片片頭。取自YouTube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8g20xt9bpE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6月14日。



圖4 清 徐懷祖 《臺灣隨筆》 清道光十一年六安吳氏木活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010660

這些侷限一旦混合官僚的使命感或優越感，便使得大陸文化對於南島、海洋、靈性文化更加不見與陌生。反思帝國政策與創作者文化對他者文化造成的謬誤認知，使之不再持續作用，這也是策展團隊的顛覆與重寫。

清帝國，一個以滿蒙民族為中心、漢族菁英為治理協作者的征服王朝（dynasties of conquest），如何對邊疆民族編碼，以形成其「以滿制漢，下及諸夷和外邦」的朝貢體系？「什麼是番」的特展告訴我們，文化在此時深受官方操縱，表現在對原住民族的命名、分類、繪圖、檔案化及重大事件的處置各方面（譬如，

朱一貴（1690-1722）事件後設置巡臺御史、林爽文事件後有功原民進京朝覲等）。清宮原民文獻的盤點告訴我們：滿漢官僚階級的文字介入，形成國家以文化機制介入宰制的局面。官方檔案與官員文集（特別是漢語）在臺灣原民形象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，有著極高的權力和壟斷力。因此，故宮再現被編碼的「原民生成」軌跡，揭示跨族群、重疊的政治殖民與文化殖民，可謂結構性的翻轉。然則，在把異己納入帝國的文化統合工作時，漢官明顯比滿官更能揮灑，因此清宮舊藏中的文化偏見（cultural bias）便不能簡單歸究為滿洲殖民主義（Manch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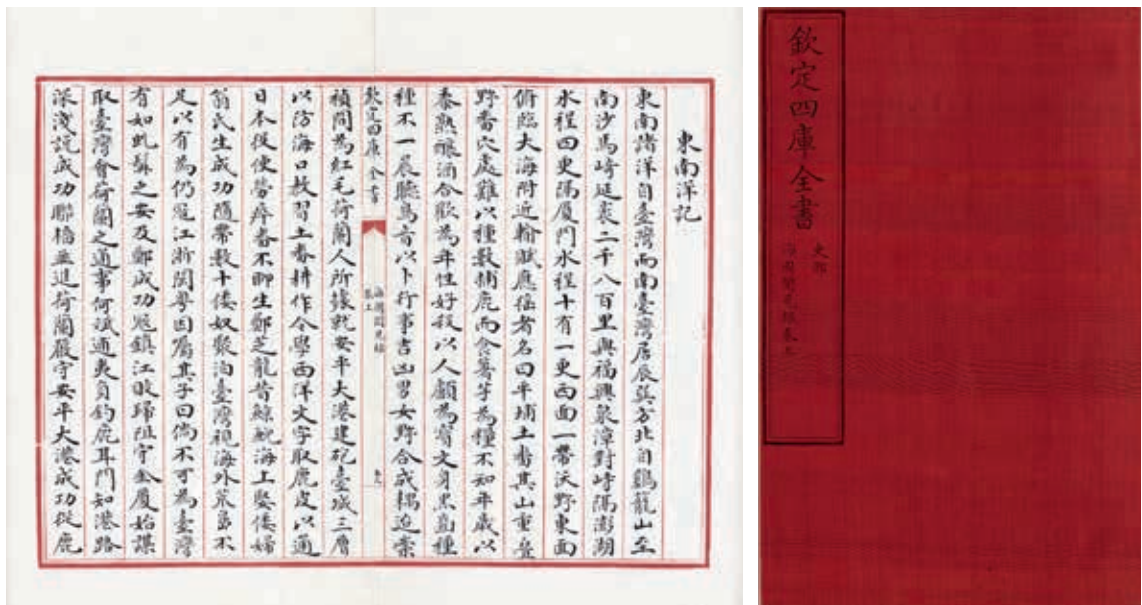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清 陳倫炯 《海國聞見錄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2886-0128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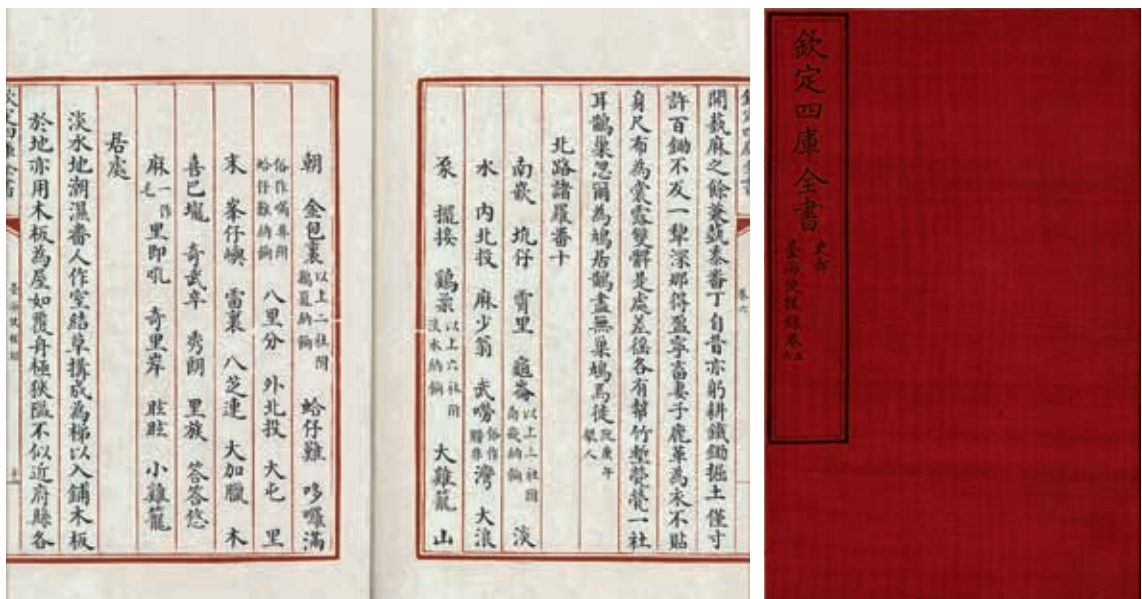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清 黃叔墩 《臺海使槎錄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2841

Colonialism) 而已。

然而，官民不同體裁與側重的文本，多樣媒介的交相凝視，畢竟不是為了任意曲解或異國想像。職貢圖裡的民族誌圖繪；徐懷祖「臺灣原

住民為徐福領出之後代」<sup>12</sup>的溯源附會（圖4）；陳倫炯《海國聞見錄》中「（野番）性好殺，以人顛為寶」<sup>13</sup>的紀錄（圖5）；抑或雍正皇帝（1678-1735）「若文官圖利，武官懈弛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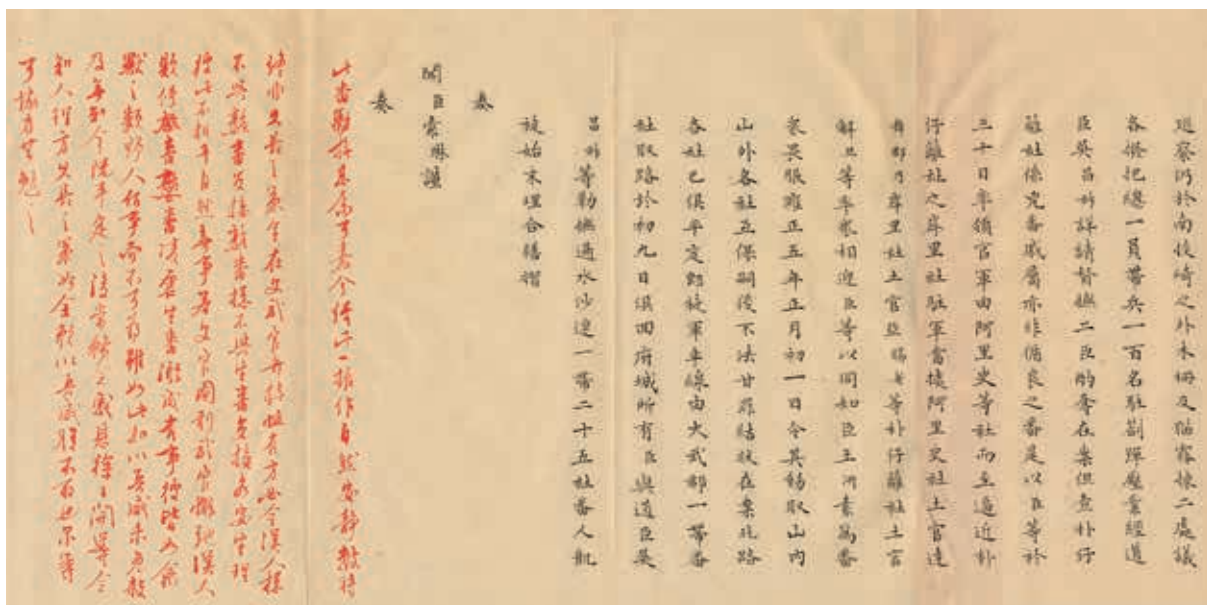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索琳 〈奏報剿撫臺灣水沙連一帶二十五社番人經過情形〉 27扣 局部 雍正5年1月12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7171

漢人欺侵熟番，熟番凌辱生番，激成有事，彼皆為禽獸之類，野人何事而不可為」<sup>13</sup>的硃批（圖6），在在顯示以本位主義理解他者、納編異質文化的實用主義立場。陳第、郁永河等閱歷大江南北的官員，依據親訪實察建構的原民族文化地理知識，黃叔瓚（1666-1742）的《臺海使槎錄》（圖7）、〈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〉（圖8）地理、族群、賦稅資訊的集結構想，其背後也都混雜了漢官的文化自負、表述習性、修辭系統，不斷作用於他們翻譯他者、縫合差異和價值評斷之中。

### 逆寫帝國：原住民族檔案的展示思惟

清治 212 年間，是漢文第三人稱原住民族異已論述大量累積的時期。

漢文異已論述的初現期為明鄭王朝，但質量不及清代，更早則以荷蘭文、西班牙文的再現為主，且未被清代銜接為原民治理的資源。直到日殖時代 1902 年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

以系統方式推動調查開始，清代及早先各政權的原民論述才被轉譯、對位、取捨、運用，至國府時期之 1950 至 1970 年代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活絡發展，三百餘年的異已論述更已盤根錯節，在各種領域形成知識、偏見或論戰。因此，打開故宮舊藏，審視滿族主宰的族群階序，漢官思維的原民文化建構，以及滿、漢、原民參差的治理分工，可謂從異已論述「關鍵的生成年代」切入、清理。

清帝國，亦是以「東番」這個命名，將原住民多部族統合為「臺灣原住民族」前置概念的政權。今日漢文體系中的「番論述」有不少源自彼時的建構。這些遺產是創傷，是負擔，但有些也已被部落轉化為「證明」或「發明」，譬如利用於自我東方主義的表演，或作為主體性建構的歷史根據。借用克里弗德的話說，這就是原住民族的容身調適，以向內復返又向前連結的姿態，回應殖民創傷，在非連續的權力關係中建構一套持續轉化的生存模式。





圖8 清 黃叔瓚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794

帝國之眼下被文獻體制異國情調化和污名化的臺灣原住民族，數百年來承受著從屬階級的命運，但他們並非毫無能動性。在原民現身以後，二元結構、三元結構（滿／漢／諸夷）的殖民論述不得不失效崩塌。事實是，清帝國

的治理階層並非只有一個民族，被支配的臺灣諸族群也無法定於一尊，正因歷史的多歧，原民現身以後才有銜接的空間與路徑。

清帝國崩解了超過一個世紀，重寫清帝國霸權裡徘徊不去的第三人稱地方史如何可能？

註釋：

1. Anthony J. Hall, *The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Fourth World: The Bowl with One Spoon* (Montreal: McGill-Queen's University Press, 2003), 141.
2. Bill Ashcroft et al., *The empire writes back: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 colonial literatures* (New York: Routledge, 1989), 208-217; Ashcroft、Gareth Griffiths、Helen Tiffin 合著，劉自荃譯，《逆寫帝國：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》（臺北：駱駝，1998），頁 41-125。
3. Homi K. Bhabha, *The Location of Culture* (Britain: Routledge, 1994), 74.
4. 許雙于，〈非洲逆寫：當代非洲作家如何重塑歐洲中心主義〉（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7），頁 29-35。
5. 詹姆斯·克里弗德（James Clifford），林徐達、梁永安譯，《復返：21世紀成為原住民》（苗栗：桂冠圖書，2017），頁 17-28。
6. 參見，孫大川，《久久酒一次》（臺北：山海文化雜誌社，2010，復刻增訂版），頁 24-113。
7. 參見，孫大川《夾縫中的族群建構：臺灣原住民的語言、文化與政治》（臺北：聯合文學，2010），頁 161-169；孫大川，〈鬆散而有效的連結——比較文學中的創作側面神聖的回歸〉，未刊稿。
8. 瓦歷斯·諾幹，〈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去殖民——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〉，收入孫大川主編，《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（評論卷下）（臺北：印刻，2003），頁 127-151。



展示臺灣原住民社會與滿洲殖民主義的遭逢，是一個開始。如何在帝國檔案的提取中避免落入線性演化史的獨白？透過博物館的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技術，累積原民現身的資源與契機，搭建逆寫的舞臺，虛位以待各種族群與

角度的介入書寫及逆寫帝國，是故宮對「國家典藏」任務的自我挑戰，也是其對跨國原住民政治與文化風潮的回應。

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

- 
9. 在聲音傳播方面，包括口傳、口白、歌謠、口技、其它形式的聲音，以及誇飾、渲染、靜默等聲情。在靈性溝通方面，包括想像力、冥想等。在身體傳達方面，包括肢體、手勢、眼神、表情、黥面、手紋、體文、身體裝飾、感染力等。在樂舞傳統和祭儀話語方面，包括自由填詞的舞步、吟唱、隊形變化、儀式、律法、禁忌等。在工藝符號方面，包括編織、雕刻、服飾、建築（譬如石板屋）等。在底層文化訊息的傳播方面，包括人際關係與社會操作時的倫理對位、應對進退、情感的沉斂抒發等潛規則。參見，孫大川，《夾縫中的族群建構：臺灣原住民的語言、文化與政治》，頁 167。
  10. 孫大川，〈神聖的回歸——臺灣原住民族祭儀的現況與再生〉，《臺灣戲劇學刊》，11 期（2005.7），頁 253-268。
  11. 孫大川，〈捍衛第一自然：當代臺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始生命力〉（臺北：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，2006 年 11 月），頁 1-14。
  - 12.（清）徐懷祖，《臺灣隨筆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本，《學海類編》，冊 117，頁 190。
  - 13.（清）陳倫炯，《海國聞見錄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故庫 012886，頁 13。
  14. 此奏摺為有關骨宗事件水沙連社的反叛。參見（清）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索琳，〈奏報剿撫臺灣水沙連社一帶二十五社番人經過情形〉，雍正五年元月十二日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故宮 007171。
-